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筆者在研究所時期曾修習蒙文，雖然時間過於短暫，無法深入研究，對蒙古語文只有粗淺的認識，卻開始對蒙古的文化產生了興趣，因為語言與文化的關係是無法分開的，藉由對一種語言的認識讓筆者間接地了解該民族的部分文化意涵，因此在筆者對蒙文的認識過程中，漸漸地產生了對蒙古文化的欣賞。在筆者大學時期，也接觸過一些關於蒙古的文學作品或史詩，那種質樸與磅礴的氣勢，更讓我加深了對蒙古的興趣，所以希望能夠以蒙古作為我研究的對象，進而撰寫相關論文。

蒙古學早已成為國內外的一門顯學，蒙古，不只在中國歷史上建立了元朝，更由於蒙古西征，建立起一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讓歐洲人深以為懼，蒙古西征深深地影響了世界歷史之發展，因此研究蒙古學並不單只是研究中國的歷史，其中更包括了中亞史、世界史、歐洲史等多樣豐富的角度，由此可知，在研究題材如此充沛的情況下，不喻可知，出類拔萃者亦不在少數，故筆者衡量在這樣的情形下，試圖要在與蒙古相關的議題中找尋能夠撰寫論文的出發點。

上述所謂研究蒙古學的重點多半是著重在漠南蒙古，也就是現今我們所稱的內蒙古地區，對於較不為人所重視的衛拉特蒙古或西蒙古，似乎只在民國時期研究西北邊疆歷史時才稍有涉及，或者是一些學者在進行邊疆民族調查時，才提及與甘肅、新疆、青海等地的蒙古族歷史或現狀有關的部分，在 1949 年之前，與青海蒙古族相關的文章，數量甚少，幾乎不到 20 篇。<sup>1</sup>所以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

<sup>1</sup> 半一之主編，《青海蒙古族歷史簡編》（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 4。

或許青海蒙古的研究是一塊新興之地，有待更多研究者的加入。十三世紀前，青海並沒有蒙古人的存在，至於，為什麼會有蒙古人移居到青海這塊地區居住，有什麼樣歷史、社會或經濟上的因素，這是筆者相當好奇的部分。

像青海這樣地廣人稀、土地貧瘠的地區，由於生活條件的困苦，常常必須爲了生計問題擔心，既然如此，又爲什麼會有蒙古人不辭千里地移居到此地來呢？這點就可能要從歷史上的因素來了解並說明；從另一方面來看，不可否認地，不管處於社會發展的那一個階段，宗教的確是伴隨著人類精神文明與自然環境的發展；特別是民族混居的邊疆地區，宗教的影響一定會反映在不同民族的生活各層面，如經濟活動、生活習俗、政治及民族關係等。所以在不同的朝代中，中央政府除了維持帝國運行的正常性之外，也必須對各個民族的宗教加以羈縻，制定適合的宗教政策，以維持帝國的統一性及完整性。

一直以來，在北亞的信仰體系中，普遍流行著自然崇拜、泛靈論爲主的薩滿信仰（shamanism），<sup>2</sup>就蒙古而言，除了一小部分生活在較肥沃土壤地區者的蒙古人之外，絕大部分的蒙古人一直都是生活在天蒼蒼、野茫茫的草原上，在這樣一片土地上所發生的暴雨、閃電、狂風、乃至日月星辰的變化，都被認爲是天的力量，因此「天」及自然界中的山川、森林、江河也就成爲蒙古人所崇拜的對象。由一些少量的文獻，筆者得知青海的蒙古人有祭青海湖的活動，但蒙古人對於祭祀「青海湖」的這項活動究竟起於何時，在清代以前顯少史料記載，只有記載顯示自固始汗（1582-1654，又作顧實汗，本名圖魯拜琥，藏名敦真卻吉嘉波，爲持教法王之意）起有祭海的活動，但無更進一步找到證據足以證明，只有「青海」的名稱零星的出現在各史料中，因此難以考證，在能夠找到的資料中，只有清代的祭海資料較多。在這樣的情況下，讓筆者對於祭祀青海湖的活動產生好奇，爲什麼只有清代有關於祭祀青海湖的資料，而其他朝代的記錄卻很少？故筆者決定以祭祀青海湖的活動作爲了解青海蒙古的研究點，也選定清代作爲研究的時間範

---

<sup>2</sup> 是通古斯語中「巫祝」的意思，它是一種對於自然崇拜的所有原始宗教的統稱，並不專以蒙古地區爲限。引自札奇斯欽，《蒙古社會與文化》（台北市：商務，1987），頁 151。

圍，這樣所得到的資料較具有可信度。

如前所言，中央政府往往會將宗教政策視為維持帝國統一性與完整性的重點，特別是清政府也是由地處東北的滿族所建立的，是一個外來的民族政權，所以清政府更懂得如何去利用不同民族間宗教信仰的力量來維持帝國的強盛，所以清代中央政府為了統治邊疆的民族、調和多民族之間的民族關係，維持自身帝國的強盛及統一性，故針對了不同的民族而實施不同的宗教政策。清代統治者也很重視邊疆政策的主體精神，像雍正就明確指出「從俗從宜」、「各安其習」，<sup>3</sup>乾隆也曾強調「以外藩習俗，與中國異，宜不欲投誠降服，亦惟爾便」。<sup>4</sup>所以，從祭青海湖神的活動中，我們除了瞭解表面上所看到的宗教崇拜意涵之外，當然也包括在清代統治下，如何調和蒙藏之間的關係，以達到安定邊疆並控制蒙古的政治意涵，所以筆者希望藉由青海蒙古人祭湖活動的探討，更加了解青海蒙古與滿、藏及其他民族之間的關係與互動。

另外，筆者也希望此篇論文完成後，除了為青海蒙古的研究多添一筆之外，也希望藉由本篇論文的完成，能對祭祀青海湖有多一份的了解，也能讓大家了解除了內蒙之外的其他蒙古地區，目前已經有部分的日本研究學者開始注意到青海蒙古的研究，並組織小型的調查團，前往青海當地收集一些珍貴的田野資料，<sup>5</sup>而當地地方政府也為了吸引國內外的關注，近年來辦了不少國際性的活動，喚起大家對於這塊西陲之地的重視，如環青海湖自行車賽（已經舉辦了三屆，參加者多為歐、亞的選手）及蒙古文學研討會等，這一切都是為了希望能夠有人更加注意青海這塊土地，不管是研究也好、發展也好，青海都擁有很大的空間。

---

<sup>3</sup> 《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台北：華聯書局，1964），卷 80，頁 8。

<sup>4</sup>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台北：華聯書局，1964），卷 555，頁 33。

<sup>5</sup> 筆者在西寧收集資料時，曾遇到來自日本的研究調查小組，正欲前往海西作民間文學的田野調查。根據當地人的了解，這一、二年來，有許多日本的調查小組趁著暑假的時間前往青海各地調查研究，這表示日本研究者也開始注意到青海蒙古這塊研究範圍了。

##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篇論文主要採取的研究方法為訪談與文獻分析法：

### 一、訪談

筆者所謂的訪談與一般的訪談法略有不同，由於筆者所研究的時間範圍是清代，故無法像一般的訪談法是針對現時相關之人、事、物作民族志式的訪問，所以筆者前往研究地，企圖尋求幾位曾研究過祭青海湖的學者，向其求教與討論，因為專研青海蒙古的學者並不多，很多研究都是歷史性的論述，缺乏專題式的討論與祭海活動有關的文章，所以在與青海當地研究學者求教後，對祭海的活動也比較了解，獲益良多。筆者曾求教於青海民族學院的聶一之老師（老師現已離休），聶老師對於歷史的考證相當地嚴謹，也是當地研究祭青海湖比較全面及系統的第一人，經過筆者與聶老師的請教後，對於祭海的儀式及目的有了連貫的認識：從固始汗之時開始有祭海的活動，一直到中共建政後就停止，而有文獻記錄的部分又較這段時間為短。剛開始祭海的時間為春天，因為冰雪在那時都已融化，但自雍正三年後，就一律改為秋天了，通常是在中秋節前的日子；祭海是爲了會盟，所以事少會盟就少，因為不需要宣傳政令，而會盟少則祭海也會隨之減少；到民國之後，時間就更不固定了，最後，聶老師也說明了當時祭海地點的地理因素，而推測青海之碑現可能藏於湖東農場之中。另青海民院的賈晞儒老師也爲筆者解釋了關於傳說的這部分，讓筆者獲益不少。

### 二、文獻分析法

針對所收集到的相關資料與文獻，作分析與歸納，並試圖對整個祭湖的活動作一個全盤性的了解，因為對於祭青海湖的相關研究，多半是研究信仰儀式之過程或從政治層面探討，所以筆者試圖在政治關係外，也從民族關係與經濟生活兩個角度來看，希望能有不同的思維。另外一些地方志和碑文也是在研究時，可作爲佐證的工具之一。藉由青海黨校韓官卻加老師的幫忙，讓筆者也在青海省圖書

館收集到一些抄寫自南京史料整理處檔案的祭海文獻，對於撰寫論文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及實證。

關於本篇論文的時空範圍，空間主要是以清代青海這塊土地（[附圖一：清代青海形勢圖](#)）為主，附近鄰近相關的區域為輔，時間則是以西元 1773 年至 1940 年，了解祭海過程的演變。時間之所以從 1773 年到 1940 年，主要是因為清代乾隆三十八年（西元 1773 年），西寧辦事大臣伍彌泰奏：「青海龍神應請每年致祭，嗣准（經）禮部議准，每年秋季致祭一次，太常寺頒發香帛，陝甘總督委道、府一員陪祭」，<sup>6</sup>以後相沿成例。蒙古舊俗，以萬物復甦為喜慶之時，故早期的會盟多於春天舉行，自清代派大臣主持會盟後，則改於秋間舉行。爾後，到了嘉慶年間，青海蒙古日漸衰微，祭海與會盟流於形式，有名無實，斷斷續續。道光十二年（西元 1831 年），當時的西寧辦事大臣桓敬建成海神廟，從此祭海儀式改在廟中進行，<sup>7</sup>後因年久失修，殿屋塌陷，同治年間則改為設帳而祭之。其後，祭海時興時衰，直到宣統年間，由於西北政局不穩，祭海典禮甚至中斷。清亡，民國建立之初，祭海與會盟之俗再度恢復實行。

西元 1928 年後，中央政府為了籠絡蒙古與藏人的首領，祭海規模愈來愈大，氣氛更是熱烈，其中以 1940 年那次最為盛大，中央除了派遣當時國民黨駐蘭州戰區的長官朱紹良主祭外，還撥了專款五萬元交由青海省政府回禮予蒙藏領袖，青海省政府也另外撥專款以準備相關事宜。<sup>8</sup>自該次之後，祭海活動逐漸衰弱，1949 年之後，祭海活動就停止了，雖然時至今日也有祭海活動，不過已經演變成為觀光賣點。筆者推測可能由於中共主張無神論，也不允許偶像崇拜，所以祭海活動和其他宗教活動一樣，受到被中止的命運。

在上述時空範圍下，本篇論文的架構分為六章，依次為第一章緒論、第二章青海湖祭的演變、第三章湖祭與政治的關係、第四章民族關係與湖祭、第五章從

---

<sup>6</sup>（清）長白文孚，《青海事宜節略》，頁 7。

<sup>7</sup>鄧承偉、基生蘭，《西寧府續志》（蘭州：蘭州古籍出版社，1990），卷 9，頁 619。

<sup>8</sup>青海省志編纂委員會編，《青海歷史紀要》（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頁 347。

湖祭與當地的經濟行爲、最後一章結論。

首先，在緒論中，筆者指出研究的動機及目的，並對論文中所提到的重要名詞預作解釋及說明，另外也指出本篇的研究方法、架構及相關文獻回顧，還有書寫時可能受到的限制等等；在第二章中，先了解青海湖的地理位置及神話傳說，接著說明祭青海湖的儀式與過程，在祭湖過程中，各個民族的成分與重要性有所不同，因此，祭湖對各民族的影響也不一樣，藉由文獻資料，去了解祭青海湖對不同民族的意義；第三章中，從中央政府對青海邊陲地區的管理政策，去分析蒙古人對於滿清政府的民族地位，並藉著了解祭青海湖的儀式，分析滿清政府的政治及宗教目的，另外，在藏族加入祭海儀式成爲祭祀成員後，祭青海湖又有何種影響，也是筆者想要探討的部分。

第四章中，說明自明清以來，蒙藏民族就一直爲了青海環湖草原的肥沃牧地有所紛爭，除了經濟因素之外，藏傳佛教的不同派別也爲了鞏固自己力量，企圖與蒙古人結成聯盟，所以蒙藏之間的民族關係一直因爲經濟與宗教的因素而呈現緊張的狀態，彼此都極欲拉攏有政治權力的中央政府，以增強自己的勢力；另外在清末時，回族馬步芳的統治也造成了重大影響，所以在民國之後，滿、蒙、藏的關係又是如何變化，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課題；在第五章中，由於三年一祭的祭青海湖與會盟，對游牧民族而言是一次盛大的集會，所以勢必會影響到該地居民生活方式與商業交易，或是羊毛業的出口，筆者想探討是否在這樣的情況下，青海當地的蒙藏民族經濟的發展又是如何；最後結論部份，將上述各章的摘要，作一個總結。

另外，本篇論文在撰寫過程中，亦有受限的地方。相對於內蒙古研究的興盛，青海蒙古的研究之所以不興盛，有其客觀因素，主要是因爲它遠離蒙古人居住的中心位置；再者由於它地理位置的偏僻，雖然偏僻卻又不位於邊疆，所以沒有所謂邊境的政治敏感度；加上青海的經濟困難，在這些因素的交相影響下，青海蒙古的研究目前終究尚未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研究。而在元、明、清等朝所留下關於青海蒙古的記載也多與政治活動相關，軍事鎮壓、統治措施、劃界編旗等等，

關於人民文化活動的資料則相當缺乏，所以在筆者研究青海蒙古時，對於資料的類型可能會受限，不過筆者會儘可能地利用資料，故文化層面的資料不足，是本篇論文的困難之一。

再者，雖然筆者曾經修習過蒙文有一段時間，但對於要閱讀蒙文資料仍有困難，這點是筆者在收集資料上，所發現的不足，由於中文資料的不足，而蒙文的資料又不能為筆者直接利用，與蒙文有關的資料只能藉由翻譯來解決不足的部分，但在翻譯青海蒙古相關研究的著作中，目前也尚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所以語言能力不足，導致閱讀資料種類受限，也是筆者在撰寫論文時遇到的困難。

### 第三節 文獻回顧及名詞解釋

在台灣，關於青海蒙古的研究，筆者並未發現相關專著，大陸方面有幾本較具代表性的書，分述如後：

- 一、卅一之教授所編寫的《青海民族史入門》<sup>9</sup>：此書介紹了目前聚居在青海的五族（藏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和回族）歷史、研究概況、相關文獻，對於要了解青海民族史的人而言，提供了很大的幫助，由於此書有翻譯成日文版，日本著名學者若松寬並著文表示：「該書是一本水平較高的研究入門書」<sup>10</sup>。
- 二、卅一之教授主編的《青海蒙古族歷史簡編》<sup>11</sup>：本書是第一部針對青海地區蒙古人所編寫有系統的專書，主要從蒙古汗國時期到中共建政前，記載在青海地區所發生的大事，主要側重政治層面，是筆者撰寫論文的重要參考依據。

---

<sup>9</sup> 卅一之，《青海民族史入門》（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sup>10</sup> 若松寬著，烏力吉譯，〈卅一之編著《青海民族史入門》〉，青海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頁102。

<sup>11</sup> 卅一之主編，《青海蒙古族歷史簡編》（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三、青海省志編纂委員會所編的《青海歷史紀要》<sup>12</sup>：該書從史前時代到解放前，以事編年，記載有關青海地區所發生過的政治、軍事、經濟、文教、民族與宗教的大事，另附有歷史地圖共十一幅。

四、崔永紅、張得祖、杜常順主編的《青海通史》<sup>13</sup>：該書從古代到近代，依照時間的脈絡書寫，以年記事，其中仔細記載了每一朝代的經濟、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大事。

除了上述幾本著作之外，另有幾本是與蒙、藏民族相關的論著，略述如下：

一、成崇德主編的《清代西部開發》<sup>14</sup>：本書共分新疆、西藏、蒙古、滇桂四大部分，每一部分各有若干章，按照時間的順序詳細地描寫了各地區的發展與狀況；其中西藏與蒙古的部分，可供筆者參考。

二、余梓東的《清代民族政策研究》<sup>15</sup>：此書則是第一部以專書形式講述清代的民族政策，介紹了中央與地方在不同民族政策下的作用，也評論了中央制定民族政策的狀況。

三、王輔仁、陳慶英的《蒙藏民族關係史略》<sup>16</sup>：書中用翔實的史料，簡述了十三世紀到十九世紀中葉，即元、明、清時期蒙古人與藏人在政治、文化、經濟、宗教等方面的來往及影響。

四、札奇斯欽的《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sup>17</sup>：該書讓我們在了解蒙古的同時，能夠窺見歷史上蒙藏間的互動，書中並援引了豐富的史料文獻，並相互對照。

五、馬汝珩的《清代西部歷史論衡》<sup>18</sup>：該書共分五部分，分別是清代邊疆民族地區的統一、清代的邊疆民族政策、土爾扈特前期史、蒙古和新疆歷史人物、清代對回政策研究等，其中前二部分論述也可供參考。

---

<sup>12</sup> 青海省志編纂委員會編，《青海歷史紀要》（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sup>13</sup> 崔永紅、張得祖、杜常順主編，《青海通史》（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

<sup>14</sup> 成崇德主編，《清代西部開發》（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sup>15</sup> 余梓東，《清代民族政策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

<sup>16</sup> 王輔仁、陳慶英編，《蒙藏民族關係史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sup>17</sup> 札奇斯欽，《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78）。

<sup>18</sup> 馬汝珩，《清代西部歷史論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六、趙雲田的《清代蒙古政教制度》<sup>19</sup>：全書分爲十三章，先概述明清之際蒙古社會情況和清統一蒙古的過程，再分九部份分析清代的政教制度，全書反應出清代蒙古政治和宗教制度的全面輪廓。

描寫民國初年之軍閥統治青海的情形，也有幾本研究著作，條列如下：

一、像默利爾·亨斯博格著，崔永紅譯，《馬步芳在青海》<sup>20</sup>：描寫了 1931-1949 年馬步芳家族在青海的影響及青海所發生的重大事件，而本書的特色所在即是除了漢文資料外，作者也搜集了大量的西文資料，特別有些資料是我們所不易見的，所以格外顯得珍貴。

二、楊效平的《馬步芳家族的興衰》<sup>21</sup>一書：從馬步芳家族的興起到佔據青海，從二次復興到權傾西北，甚至到最後的國外生活，按時間脈絡，對於筆者了解民國之後的青海，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關於史料方面的資料有：

一、齊木德道爾吉、巴根那編《清代太祖太宗朝實錄蒙古史史料抄》<sup>22</sup>：以乾隆本爲底，摘錄了清實錄中蒙古史料，並同日本內閣文庫本康熙本加以比較而成，對於了解清初的蒙古史料有很大幫助。

二、齊木德道爾吉、黑龍、寶山、哈斯巴根、任愛君編的《清代聖祖朝實錄蒙古史史料抄（上）、（下）》<sup>23</sup>：是以中華書局影印乾隆朝定本之清聖祖實錄爲底本，收集蒙古部落之相關區域所發生的事，可了解清初時的蒙古面貌。

三、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所編的《年羹堯奏摺專輯（上）、（下）》<sup>24</sup>：記載年羹堯對青海建設的建議及奏摺，其中也刊載了對青

---

<sup>19</sup> 趙雲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89）。

<sup>20</sup> 默利爾·亨斯博格著，《馬步芳在青海 1931-1949》（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

<sup>21</sup> 楊效平，《馬步芳家族的興衰》（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

<sup>22</sup> 齊木德道爾吉、巴根那編，《清代太祖太宗朝實錄蒙古史史料抄》（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

<sup>23</sup> 齊木德道爾吉、黑龍、寶山、哈斯巴根、任愛君編，《清代聖祖朝實錄蒙古史史料抄（上）、（下）》（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3）。

<sup>24</sup>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年羹堯奏摺專輯（上）、（下）》（台北：故宮博物

海影響甚大的《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的內文，是較為詳盡的一種版本。

四、(清)長白文孚所著的《青海事宜節略》<sup>25</sup>，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蒙藏之間來往的互動關係。

五、清代歷代皇帝實錄：實錄記載皇帝的舉止言行，包括典禮、祭祀、視朝、巡幸等；定禮儀、正樂律、治曆法、勘方輿一切經欽定者；恩賞、旌表；命將出師，調兵籌餉，開拓疆土，改土歸流；兵制、驛傳；刑罰；壇廟工程，河堤水利等等。可以說舉凡朝章國政，無所不包，事無巨細，均由皇帝躬親裁決。

期刊部分有青海蒙古的相關資料，分述如下：與青海蒙古的發展及演變相關的有杜常順〈簡論 1654 年至 1723 年的青海和碩特蒙古〉<sup>26</sup>，文中有條理的論述了青海蒙古的發展及變化，為清初中央政府與蒙古之間的來往提供了相關資料；韓官卻加的〈青海蒙古族部落的變遷與衰落〉<sup>27</sup>將青海蒙古的由來作了介紹，也提到青海盟旗制的建立；王希隆的〈年羹堯「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述論〉<sup>28</sup>為青海在羅布藏丹津之亂後的善後措施作了分析，讓我們更加了解年羹堯對青海的想法；關於青海湖的傳說及祭儀活動有吳尚平著的〈青海湖的傳說〉<sup>29</sup>可供參考；青海省圖書館輯〈祭海史料輯錄之一〉<sup>30</sup>及〈祭海史料輯錄之二〉<sup>31</sup>也可作為我們了解祭海情況的重要參考史料。

蔡志純著的〈清政府對蒙古的民族政策〉<sup>32</sup>內容為清政府對蒙古實行的政

---

院，1971），故宮文獻特刊第二集。

<sup>25</sup> (清)長白文孚，《青海事宜節略》(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sup>26</sup> 杜常順，〈簡論 1654 年至 1723 年的青海和碩特蒙古〉，《青海社會科學》，1990 年第 1 期，頁 83~88。

<sup>27</sup> 韓官卻加，〈青海蒙古族部落的變遷與衰落〉，《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6 卷第 4 期，2000 年 10 月，頁 38~43。

<sup>28</sup> 王希隆，〈年羹堯「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述論〉，《西藏研究》，1992 年第 4 期，頁 27~36。

<sup>29</sup> 吳尚平，〈青海湖的傳說〉，《絲綢之路》，2001 年第 6 期，頁 41~42。

<sup>30</sup> 青海省圖書館輯，〈祭海史料輯錄之一〉，1995 年，手抄本，抄自南京史料整理處檔案，藏於青海省圖書館。

<sup>31</sup> 青海省圖書館輯，〈祭海史料輯錄之二〉，1996 年，手抄本，抄自南京史料整理處檔案，藏於青海省圖書館。

<sup>32</sup> 蔡志純，〈清政府對蒙古的民族政策〉，《歷史教學》，1981 年第 10 期，頁 5~11。

策作介紹與分析；杜常順〈清代青海的盟旗制度與蒙古族社會的衰敗〉<sup>33</sup>，對青海蒙古社會的興衰作了論述，其中也提出了大家容易對盟旗制度產生的錯誤概念；李建寧〈清代管理青海牧區的方略〉<sup>34</sup>將青海蒙古的管理分為前後期，文中也有提到對青海藏族的管理，以及喇嘛教對蒙藏民族的影響；魏英邦的〈十七—十八世紀時蒙古族部落變革史略（上）、（下）〉<sup>35</sup>將蒙古族的演變作了簡要的說明；丘向魯的〈青海各民族移入的溯源及其分布之現狀〉<sup>36</sup>解釋了各民族入青的時間及歷史背景；曹娅麗的〈青海湖“祭海”、“跳神”禮儀〉<sup>37</sup>也讓我們對祭海儀式的再現有較初步的認識。

爲了以下行文順暢，及定位筆者對於青海蒙古的研究，有必要先對論文中所提及的重要名詞作解釋與釐清，首先，本篇論文題目中所提到「青海湖祭」，指的是祭祀青海湖的活動，當地人多稱爲「祭海」，並表示未聽過「祭青海湖」之名，但的確有這樣的活動，稱作「祭海」；筆者推測當地人所稱「祭海」之「海」很有可能指的就是「青海湖」，因爲受到當地藏傳佛教之影響而有此稱呼，藏人稱高原湖泊爲「海子」，所以在當地習慣把「祭青海湖」的儀式活動稱爲「祭海」。

其次，在漢文典籍和地方志書中，稱清代活動在環湖草原的西蒙古爲「青海蒙古」，這主要指的是以固始汗爲首的和碩特蒙古。本論文中所要探討之「青海蒙古族」並不專指和碩特蒙古而已，主要涵蓋的範圍是指在清代以青海爲中心而活動的蒙古人，當然以和碩特蒙古爲主，但也包含少數被和碩特蒙古所征服之土默特蒙古、喀爾喀蒙古、及其他部落的蒙古人等；而在文中所用「青海蒙古族」之「族」字，不是指大陸舉行民族識別後的族別身分，而是指涉任一個群體，這是先對青海蒙古族的定義作說明。

---

<sup>33</sup> 杜常順，〈清代青海的盟旗制度與蒙古族社會的衰敗〉，《青海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頁85~89。

<sup>34</sup> 李建寧，〈清代管理青海牧區的方略〉，《青海民族研究（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3期，頁13~18。

<sup>35</sup> 魏英邦，〈十七—十八世紀時蒙古族部落變革史略（上）、（下）〉，《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80年第2期，頁7~40。

<sup>36</sup> 丘向魯，〈青海各民族移入的溯源及其分布之現狀〉，《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青海分冊）上》（蘭州：甘肅省圖，1986年），頁320~331。

<sup>37</sup> 曹娅麗，〈青海湖“祭海”、“跳神”禮儀〉，《青海社會科學》，2002年第2期，頁98~102。

本篇論文中也將會提到與青海蒙古互動頻繁的青海藏人，主要是以分布在青海湖地區、長江源頭和黃河上游等處的藏人為主，由於在清代的統治中，藏族部落的數目時有增減，其游牧地方也常有變更，所以在中共建政前，習慣將青海藏族的各部劃分為游牧和農耕的地區，計有玉樹二十五族、環海八族、果洛三族及海東各部。

#### 第四節 青海蒙古人的形成與演變

青海，本來是一個湖泊的名稱，也是大陸最大的內陸鹹水湖，古籍中所說的「青海」，指的就是「青海湖」。「青海」的名稱最早出於北魏，《水經注·河水篇》：「縣西有卑禾羌海者，世之謂青海」；<sup>38</sup>《魏書·吐谷渾傳》也載：「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sup>39</sup>之後，各朝歷史多稱為「西海」，《西寧府新志》中載：「青海即西海，在湟中，西海面有七百餘里，為眾水會歸之所，故海岸東西南北皆有水泉，厥草豐美，宜畜牧」。<sup>40</sup>在古藏文史料中也稱「措溫波」，「措」意指湖或海子，「溫波」是指藍色或青色，元朝時蒙語稱「庫庫諾爾」，意思也是「青色的湖」；一直到 1928 年秋，青海終於被決議作為省名，當時北伐之後，南京政府決定建省，按照地名的通例，以該省內大湖之名作為省名，自此之後，青海成為一省之名，而原先「青海」之名所稱之湖泊，則更名「青海湖」，以資區別。

青海是個多民族地區，一直以來就有漢人、羌人、吐蕃人聚居，十三世紀前，蒙古人尚未進入青海地區，關於蒙古部眾第一次進入青海的時間，共有兩種說法：一是宋開禧二年（西元 1206 年），在《蒙古源流》卷六中說：「歲次丙寅，

---

<sup>38</sup>（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台北：商務，1968），卷二，頁 2。

<sup>39</sup>《魏書》，（台北：中華書局，1965），卷一百一，頁 9。

<sup>40</sup>（清）楊應琚，《西寧府新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卷二十，頁 729。

蒙古軍會於柴達木盆地，行兵圖伯特（今之西藏）」：<sup>41</sup>一是宋寶慶三年（西元 1227 年），在《元史·太祖本紀》中載：「太祖二十二年丁亥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下積石州。二月，破臨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寧二州」。<sup>42</sup>蒙古人進入西寧後，劃西寧為章吉駙馬的分地，封為寧濮郡王，駐守西寧。第一種說法，從蒙古建國、組織西征、攻滅西夏等歷史考證來看，多數的民族史學者研究認為此與當時事實不符，故可靠性不大，<sup>43</sup>在此，筆者採用上述的第二種說法，即宋寶慶三年（西元 1227 年），為蒙古人進入青海地區之始。然自元朝開始，雖然進入青海的蒙古人逐漸增多，但大多數是貴族官僚，其職責是鎮守邊疆，活動範圍也僅限於黃河流域的範圍；綜觀歷史而言，在明代以前，蒙古人在青海並沒有形成強大的勢力，隨著元朝的瓦解，元朝設在青海的貴族官僚也隨之垮台。

明代在青海地區的建設與當時北方地區的民族關係及政治軍事緊密相關，雖然蒙古人被迫放棄了對內地的統治，但仍佔據大漠南北，對當時的明代仍然構成了很大的威脅，因此明代為防範蒙古勢力的南下，以及為了安置蒙古，便採用了漢武帝創河西四郡以隔絕匈奴與羌之間的聯繫之作法，在河西設立衛、所兩級軍事單位來兼攝地方行政，以確保當地的安寧，稱為塞外四衛<sup>44</sup>—定安衛、阿端衛、曲先衛及罕東衛。（附圖二：明代西寧塞外四衛圖）「塞外四衛」加上沙州衛、赤斤衛及哈密衛又稱為「關西七衛」或「西北七衛」，用以阻隔蒙藏結盟及保護內地的安定，四衛在政治上與明代為隸屬關係，經濟上也有廣泛的交流，主要是通過「茶馬互市」及「貢使貿易」來進行。

明代，西北地區的茶馬交易空前繁榮，一方面是由於明代為了抵抗蒙古，需要從西北地區輸入大量戰馬，另一方面也受到中原產品日趨繁榮的影響，於是西寧、洮州與河州成為茶馬貿易的三大中心，塞外四衛的茶馬互市主要是由西寧的茶馬司主持，茶馬互市的數量是相當大的。另外，明代政府也規定少數民族僧侶

---

<sup>41</sup> 小薩囊徹辰著，李毓澍編，《蒙古源流箋證》（台灣：文海出版社，1965），頁 298。

<sup>42</sup> （清）魏源，《元史新編·本紀》（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卷二，頁 37。

<sup>43</sup> 聿一之，《青海民族史入門》，頁 168。

<sup>44</sup> （清）楊應琚，《西寧府新志》，卷二十，頁 727~728。

首領應三年一貢或一年一貢，以此表示對朝廷的順從及歸心，而貢使在往返途中，也可乘驛站之便作交易買賣。所以明代與四衛的交易主要就是透過上述兩種方式完成。

明初，蒙古族除散居在內蒙古一帶之外，在今天蒙古國一帶的蒙古人也分爲韃靼與瓦剌（瓦剌另有一部份在新疆）兩部，其中韃靼稱爲東蒙古，瓦剌稱爲西蒙古，<sup>45</sup>其中東、西蒙古之間常常發生戰爭，明景泰二年（西元 1451 年），西蒙古的也先（也作額森，1407-1454）起兵擊殺東蒙古的脫脫不花（？-1452），統一蒙古，建年號爲天元，<sup>46</sup>但統一的局面並未持續很久。明景泰二年（西元 1454 年），也先死於內亂，西蒙古（瓦剌）也就分裂爲四部：準噶爾部、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及和碩特部。明代憲宗年間，東蒙古的達延汗（本名爲巴圖蒙克，1474-1517）再度統一大漠南北，強化了統治，以聯盟的形式維持關係，當時從北到南、從西到東依次分東蒙古爲喀爾喀、兀良哈（烏梁海）、鄂爾多斯、土默特、察哈爾、喀喇沁等六個部落，<sup>47</sup>而六個萬戶又分爲左右兩翼，左翼包括喀爾喀、兀良哈、鄂爾多斯，由達延汗直接管轄；右翼有土默特、察哈爾、喀喇沁，由達延汗的子姪管轄，但達延汗死後，蒙古又再度陷入分裂之中。

既達延汗之後，他的孫子俺答汗（又譯作阿勒坦汗，1507-1583）成爲另一個領袖人物，自明嘉靖八年（西元 1529 年）到嘉靖三十八年間（西元 1559 年），俺答汗不斷地進攻明代的北防，明嘉靖二十九年（西元 1550 年），還一度進逼到北京郊區，對明代造成嚴重的威脅。《西寧府新志》中載：

時北部俺答猖獗，歲掠宣（府）、大（同）諸鎮，又羨青海富饒，（嘉靖）三十八年，攜子賓兔、丙兔等數萬眾，襲據其地，……留賓兔據松山，

<sup>45</sup> 以蒙古部眾所佔領的地區劃分，韃靼佔據東起呼倫貝爾湖，西至阿爾泰山廣大的地區，故稱東蒙古；而瓦剌則佔據阿爾泰山以西，及天山東北一帶，故稱西蒙古。

<sup>46</sup> 王輔仁、陳慶英編，《蒙藏民族關係史略》，頁 85。

<sup>47</sup> 王輔仁、陳慶英編，《蒙藏民族關係史略》，頁 83。

丙兔據青海，西寧亦被其患，隆慶中，俺答受封為順義王。<sup>48</sup>

明嘉靖三十八年（西元 1559 年），俺答汗率部眾入青海，其間不斷以武力擾亂邊境，另一方面也留下丙兔駐守青海，明代政府於隆慶五年（西元 1571 年）與俺答汗議和，明神宗封其為順義王，至此，他的進攻才算緩和了下來。雙方並在寧夏、陝西建立互市的關係，俺答汗一方面通過互市取得經濟上的利益；另一方面，想要集中力量對付漠西蒙古，並同時經營青海地區。

此時的俺答汗開始對藏傳佛教有所接觸，《明史》中載：

丙兔乃以梵修為名，請建寺於青海及嘉裕關外，為久居計，延臣多曰不可許。禮官曰：『彼已採木興工，而今改建於他所，勢所不能，莫若因而許之，以鼓其善心，而杜其關外之請，況中國之禦戎，惟在關邊之有備，戎之順逆，亦不在一寺之遠近』帝許之。<sup>49</sup>

明萬曆三年（西元 1575 年），當時駐於青海的丙兔以焚香修佛為理由，請求明代在青海湖西北的察卜齊雅勒地方建立佛寺，明代本不願意蒙古人在青海生根，但丙兔已動工，明中央政府無力阻止，只得任其修建，待佛寺建成後，明萬曆帝賜名為「仰華寺」。<sup>50</sup>

明萬曆四年（西元 1576 年），庫圖克台徹臣洪台吉勸說俺答汗信奉藏傳佛教，建議俺答汗邀請當時藏傳佛教中名望最高的格魯派領袖索南嘉措（1543-1588）來青海相見。由於俺答汗的部眾連年征戰，精神上需求安定；另一方面，爲了要抵抗明中央政府逼他退出青海的壓力，感到有必要與西藏結成聯盟，故接受建議，而索南嘉措在受到邀請後，也很快地答應了這一個建議，動身

<sup>48</sup>（清）楊應琚，《西寧府新志》，卷二十，頁 736。

<sup>49</sup>《明史》（台北：國防研究院明史編纂委員會，1963），卷 330，頁 3798~3799。

<sup>50</sup>《明史》，卷 327，頁 3767。

前往青海。<sup>51</sup>俺答汗與藏傳佛教格魯派（又稱黃教）在仰華寺正式締結了關係，俺答汗贈索南嘉措一個尊號，「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sup>52</sup>而索南嘉措也回贈給俺答汗一個尊號，「咱克喇瓦爾第徹辰汗」。<sup>53</sup>

索南嘉措在與俺答汗會見後，並未立刻返回西藏，繼續在蒙古統治階層中傳教。而俺答汗也將他部下一名叫火落赤欽巴圖爾的貴族及其屬民留在青海湖附近，因此，在青海的蒙古諸部中又增加了一個火落赤部。之後俺答汗的子孫也依然擾亂甘肅、西寧一帶，明代也派鄭洛攻掠；明萬曆十九年（西元 1591 年），鄭洛派兵進入青海湖地區，焚毀「仰華寺」，《明神宗實錄》：

兵部題：經略尚書鄭洛奏稱先鋒兵馬至西海仰華寺，將房屋一時焚燒，各虜望見火光馳至，官軍對敵，昏夜射死，不及取首，生擒韃虜二名，餘虜逃奔山後。<sup>54</sup>

一直到幾十年後，以固始汗為主的和碩特部進入青海，蒙古諸部才又從俺答汗死後的分裂復歸統一。

從大量的歷史史料中，我們可以知道不論是元或明代，蒙藏民族之間所建立的關係，通常都是政治的考慮優先於宗教，蒙古族內的統治階級為了向藏區伸出自己的勢力觸角，常是利用自己強而有力的軍事優勢，並在取得軍事上的勝利後，進而尋求宗教上的聯絡，以利達成政治上的力量。藏傳佛教的各派也因為彼此的宗教權力抗爭，所以拉攏蒙古貴族，以蒙古貴族的武力來支持自己教派的成長，藉以擴張教派的勢力，所以藏傳佛教與蒙古貴族之間漸漸形成一種聯盟，彼此各取所需。

---

<sup>51</sup> 王輔仁、陳慶英編，《蒙藏民族關係史略》，頁 90。

<sup>52</sup> 「聖」為超出塵世；「識一切」是顯宗對取得最高成就的僧人的尊稱；「瓦齊爾達喇」是梵文 Vajradhāra 的音譯，是密宗對取得最高成就的僧人的尊稱，所以就是集顯、密宗之大成。

<sup>53</sup> 「咱克喇瓦爾」是梵文 Cakravartin 的音譯，意為轉輪王；「徹辰汗」是蒙語，指聰明睿智的汗王。

<sup>54</sup> 胡廣主編，《明神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 242，頁 7。



17 世紀初，格魯派在漠西蒙古中得到傳播，因而影響到了其他教派的利益，故遭受一連串的敵視。當時喀爾喀部卻圖汗在一場動亂中被驅逐，因而率部進入青海，征服了土默特部的火落赤部，並收安多等地供其統治，但卻圖汗是噶舉派信徒，因教派不同而生敵意，殺死大批格魯派信徒；而藏巴汗（1582-1620）家族一向對格魯派不友善，所以他們聯絡了喀爾喀部的卻圖汗，共同打擊格魯派；當時康區的白利土司頓月多杰信仰苯教，仇視藏傳佛教，特別是格魯派；受到後金政權（滿人所建立的，滿清之前身）影響而西移的察哈爾部首領林丹汗（1592-1634），因引起喀爾喀蒙古諸部的反感，以致於被迫離開了本土，並率領部眾前進到青海地區，另謀重整旗鼓的打算，當時和碩特部的勢力發展也逐漸威脅到林丹汗，所以，他也加入反對格魯派的行列，準備與卻圖汗會合，共同對付和碩特部，以便向西藏擴展自己的勢力，只可惜未竟全功而病逝於青海錫拉塔拉之地。<sup>55</sup>而林丹汗之子額哲也被俘投降，在西元 1636 年，以額哲為首的內蒙各部在盛京集會，徹底歸附了清廷，這大大地增強了清廷的軍事力量。

在當時種種的威脅下，格魯派首領羅桑卻吉堅贊（1575-1644）向漠西蒙古厄魯特四部尋求支持，當時和碩特部的首領固始汗表示願去西藏相助，《蒙古游牧記》載：

國初顧實汗（即固始汗）自西北侵有其地。……九傳至博貝密爾咱，稱衛拉特汗。子哈尼·諾顏·紅果爾繼之，有子六，圖魯·拜琥其第四子也，號顧實汗。<sup>56</sup>

於是固始汗在明崇禎九年（西元 1636 年）率部南下青海，<sup>57</sup>在陸續消滅了卻圖

---

<sup>55</sup> 札奇斯欽，《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頁 579~580。

<sup>56</sup> 張穆，《蒙古游牧記》，頁 247。

<sup>57</sup> 固始汗南下可能有其他因素，例：與火落赤等蒙古貴族爭奪青海的統治，或因準噶爾部日漸強大，為避免衝突而南下，但不管原因為何，固始汗的南下卻開創了黃教的新紀元。引自札奇斯欽，《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頁 595。

汗，康區白利土司及藏巴汗之後，固始汗登上了西藏的王位；這代表著西藏格魯派的勢力在固始汗的支持下，獲得了巨大的勝利，徹底地瓦解了格魯派的反對勢力，開創了黃教的新紀元；藏區各部的統治權也落到了固始汗的手中，在固始汗的統治之下，他將西藏的經濟權奉送給格魯派的寺院集團，因此，更加確定了格魯派在藏傳佛教中的優勢地位。固始汗應格魯派請求，用武力征服其他教派之後，由於他本身是蒙古的統治階級，所以在底定西藏之後，在藏區建立起統治政權，不僅包括西藏，就連北部的康區及東北的青海地區也都囊括在固始汗的統治之下，他順利成為統治全國藏區的一個蒙古汗王。在固始汗進據藏區之後，也採取了一連串的政治及宗教措施，他本人坐鎮藏區，建立地方政權，並扶植起達賴與班禪，令他們各自統治後藏與前藏，並以寺院為中心建立起政教合一系統，新設噶倫等職，健全了西藏的政府組織。

固始汗率和碩特部進入青海之初，同來的還有土爾扈特、輝特部<sup>58</sup>、以及準噶爾<sup>59</sup>的一支，其中以和碩特部的勢力最為龐大。另外，他認為青海地區水草豐美，有些地方可以從事農業生產，可以藉以安置和碩特部，而以青海為根據地可以抵擋來自北方其他蒙古族的力量，「顧實汗，既據有青海，分部眾為左右二翼，子十人領之」，<sup>60</sup>所以他令其諸子住牧青海；其次，他也認為以廣大康區的稅收足以補足和碩特部的花用，並保證青海部眾的安定，所以，他徵收康區賦稅，以養青海之眾。青海和碩特蒙古對境內屬民也有不同的管理方式，本族人依本民族法規，它民族依其社會組織與型態管理，當時在青海和碩特部管理下的人民，大約可以分為蒙古人（厄魯特蒙古及原已在青海游牧的土默特蒙古等部）、漢、藏、回等民族。<sup>61</sup>《西陲要略》中有對當時清代和碩特蒙古的生活方式有詳細的介紹，如衣、食、住、行、民俗等部分，可以了解當時和碩特蒙古社會的情況。<sup>62</sup>

<sup>58</sup> 原為杜爾伯特的屬部，土爾扈特西遷後，取代土爾扈特的位置。

<sup>59</sup> 此部一般稱為綽羅斯，因清平定準噶爾後，改其名為綽羅斯。

<sup>60</sup> 張穆，《蒙古游牧記》，頁 247~249。

<sup>61</sup> 隋皓昫，《青海和碩特發展史》（台北：政治大學碩士論文，1996），頁 37~38。

<sup>62</sup> 祁韻士，《西陲要略》（台北：商務印書館，1963），卷 4，頁 14~18。

此外，固始汗也考慮到當時興起於關外的新興勢力——後金政權，於是派其侄前往盛京，受到皇太極的熱情款待，順治元年（西元 1644 年），和碩汗廷與清代正式建立友好關係，順治四年（西元 1647 年），固始汗派使臣進京表示願與清中央政府修好，同時向清進貢，之後幾年，固始汗一直與清廷維持良好的關係及往來。<sup>63</sup>順治十年（西元 1653 年），五世達賴進京，順治帝曾表示：

茲以金冊印封爾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應劫現身，興隆佛化，隨機說（設）法，利濟眾生，不亦休哉。印文曰，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sup>64</sup>之印。封厄魯特部落顧實汗為遵行文義敏慧顧實汗，賜之金冊、金印。文用滿、漢、蒙古字，冊文曰，帝王經綸大業，務安勸庶邦，使德教加於四海庶邦，君長能度勢審時，歸誠向化，朝廷必加旌異，以示懷柔……。茲以金冊印封為遵行文義<sup>65</sup>敏慧顧實汗，爾尚益矢忠誠，廣宣聲教，作朕屏輔，輯乃為顧實汗印，其冊印即付伴送達賴喇嘛之侍衛喇嘛，囊努克、修世岱等賚往（帶賚）。<sup>66</sup>

清帝封固始汗為「遵行文義敏慧顧實汗」，等於昭告了此汗王的封號是由清政府所封，不是由宗教領袖所封，和以往的地位不同；也等於清政府承認了固始汗是有封圻的汗國君長，並讓其能維持封圻內的秩序；清政府要固始汗作其庶邦的君長，作清廷的屏輔，與之前受宗教上的冊封意義是大不相同的。清廷想利用固始汗來安定青海，因為當時的清廷無力顧及青海與西藏，就算間接承認他是庶

<sup>63</sup> 卅一之主編，《青海蒙古族歷史簡編》，頁 118-119。

<sup>64</sup> 「所領天下釋教」意指在一個很大的範圍中；「普通」是指普遍通曉；「識一切」是顯宗中對最高成就的僧人的稱呼；「瓦赤喇怛喇」則是密宗中對最高成就的僧人的稱呼，這個稱號表示清廷認同達賴在宗教上的領袖地位，但不是政治上的。

<sup>65</sup> 《聖武記》中作「遵文行義」之說，此採《清實錄》中的說法為「遵行文義」，參見齊木德道爾吉、巴跟那編《清代太祖太宗世祖朝實錄蒙古史史料抄—乾隆本康熙本比較》，頁 789。

<sup>66</sup> 齊木德道爾吉、巴跟那編《清代太祖太宗世祖朝實錄蒙古史史料抄—乾隆本康熙本比較》，頁 790。

邦君長，只要他聽命於清，對清廷來說就是好的開始；另一方面，對固始汗而言，當時的蒙古各部並不服他，所以爭取清廷的承認與支持，對於鞏固自己本身的勢力而言是大有幫助的。

當初固始汗進入藏區之時，也因為了解青海地處中西要道，四通八達，適合作為根基之地，因此遷徙大批天山以北的和碩特部游牧於青海，並將青海蒙古劃為左右兩翼，分給他的八子統治，史稱「青海八台吉」<sup>67</sup>，在青海的游牧地上重新建構起封建秩序，形成了世襲制度。在固始汗的監督之下，五世達賴也建立起他的政權，在會見順治帝的四年之後，固始汗死了，自然地削弱了和碩特部對西藏的統治，清康熙九年（西元 1670 年），固始汗封於西藏的長子鄂其爾汗（Ochir Khan）也死了，五世達賴羅桑卻吉堅贊趁此機會發揮了自己的才能，以宗教征服了全部蒙古。<sup>68</sup>

清代的統治者之所以要積極籠絡藏傳佛教的原因，也有自身利益的考量，首先，滿族的傳統宗教薩滿信仰是一種相信萬物有靈的原始信仰，在滿族社會的發展階段上，已經不能夠滿足統治階級的需求了，所以他們也需要有一個有力的宗教力量；其次，清廷想利用藏傳佛教來作為安定蒙古各部的武器，鞏固自己對於蒙古的統治，擴大對蒙古各部的影響，進而促進自己的統一大業。

和碩特蒙古由於固始汗去世之後，四大部落中沒有一個類似固始汗的人物，所以聯盟發生動搖，彼此對抗，與清政府之間的關係也漸疏離，當時，除了和碩特部之外，離西藏最近的就是強大的準噶爾部，康熙十六年（西元 1677 年），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開始攻伐在青海的和碩特，並積極策動叛亂，他除了對付厄魯特蒙古及天山南路，勢力更一度抵達西藏，當時青海政治上的混亂給了噶爾丹機會，於是他便趁此之勢控制了青海蒙古各部。

康熙二十七年（西元 1688 年），噶爾丹出兵喀爾喀蒙古，一路攻進漠南蒙古，

---

<sup>67</sup> 史載固始汗有十子，長子達延一系主持拉薩汗廷，第八子袞卜察無子嗣，因此統領青海的共有八子，稱為青海和碩特八台吉。

<sup>68</sup> 札奇斯欽，《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頁 597~600。

讓清政府大為震驚，於是開始一連串的武力進攻。終在康熙三十六年（西元 1697 年），噶爾丹兵敗自殺，這件事給青海和碩特蒙古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清政府也趁機招撫青海蒙古。同年，達什巴圖爾（固始汗的幼子）與西寧喇嘛商南多爾濟及塔爾寺大喇嘛察罕諾門汗同清使阿喇布坦在察罕托羅亥會盟，議定一致歸附清廷；次年，清廷認為：

厄魯特扎什巴圖爾台吉乃青海台吉之統領，與土謝圖戴青嘛木扎爾額爾德尼台吉、彭楚克台吉率其所屬，誠心歸化，當封何爵，伏候上裁。得旨，封達什巴圖爾為親王<sup>69</sup>，土謝圖戴青嘛木扎爾額爾德尼為貝勒，彭楚克為貝子。<sup>70</sup>

達什巴圖爾歸附清，標示和碩特蒙古正式成為清的藩屬，但清廷此時仍未影響到和碩特蒙古在青海的統治權力，實際上他們還是保持著割地而據的情況。從此可以看出，和碩特部的力量已大不如前，對於與清為敵，以當時他們的實力而言，恐怕勝算不大，所以商議後，決定向清稱臣。

十八世紀初，漠西準噶爾部的策旺·阿拉布坦派兵進入西藏，擊殺拉藏汗，中斷了和碩特汗廷的統治，也結束了蒙古人對西藏的統治。因此，清政府派兵入藏護衛，將準噶爾軍驅逐出藏，對於清廷來說，承認和碩特蒙古統治地位的權宜之計可以暫告結束，隨著西藏內部的矛盾擴大，也讓清廷想除掉蒙古汗王處在中央政府與西藏之間的身份。當時的清廷也的確有能力可以直接過問西藏的政務，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清廷認為青海和碩特蒙古在西藏的統治應該告一段落，並將西藏直接納入中央的統治管理之下。此舉引來了羅布藏丹津（Luobutzsng-danjin，達什巴圖爾之子，生卒年不詳）的不滿，因為他原應是和

<sup>69</sup> 清初定外藩封爵有六級：親王、郡王、多羅貝勒（間稱貝勒）、固山貝子、鎮國公、輔國公，而此六級爵位領有歲俸，有俸銀和祿米，等於是「食君之俸」。

<sup>70</sup> 齊木德道爾吉、黑龍、寶山、哈斯巴根、任愛君編，《清代聖祖朝實錄蒙古史史料抄（下）》，頁 843。

碩汗王的最佳人選，但清廷統治制度的施行，打破了他的美夢，因此讓他對清政府漸生反叛之心。

另外，由於達賴六世之爭也讓羅布藏丹津對於權勢的野心和清廷產生矛盾，不僅如此，清政府在策封護送達賴七世入藏有功者，羅布藏丹津只得到俸銀二百兩、緞五匹的薄賞，<sup>71</sup>而其他有功者不是策封為親王就是郡王，這在無形之中就降低了羅布藏丹津的地位，因而使得原先就心存芥蒂的羅布藏丹津更加反對清廷；受到清廷策封的親王與郡王，也因此偏向清廷而孤立羅布藏丹津。最後，終於在雍正元年（西元 1723 年），羅布藏丹津藉雍正繼位之初，召集了部分蒙古貴族，公開反清。同年五月，羅布藏丹津召集蒙古諸台吉在察罕托羅亥會盟，意欲恢復先人霸業，總掌諸部，故自號「達賴渾台吉」，屯兵於巴爾托羅海。<sup>72</sup>

當時兵部侍郎常壽，駐西寧掌管青海事務，於是傳令羅布藏丹津罷兵，不從則懲之，而羅布藏丹津則謊稱親王察罕丹津、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竊謀據唐古特，諸台吉不服，故欲率兵與之決勝負；但實情是二王不從羅布藏丹津，所以遭受到誣陷，清廷了解其使詐，決心討伐之。<sup>73</sup>清廷於是命川陝總督年羹堯<sup>74</sup>為撫遠大將軍，及四川總督岳鍾琪率兵平反，據《清世宗實錄》記載：

撫遠大將軍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二月初八日，遣奮威將軍岳鍾琪，率大軍往勦青海逆賊羅布藏丹津，由布爾哈屯，直抵賊巢母納布隆吉地方，分兵一千，往北路柴旦木，豫截賊眾逃往噶斯要路，岳鍾琪率兵，從南路尾追，二十日，探知賊眾逃往烏蘭穆和兒地方，及至其地，賊眾復逃往柴旦木地方，又分兵一千追逐，……擒獲吹拉克諾木齊扎錫敦多卜，

<sup>71</sup> 《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卷 4，頁 84。

<sup>72</sup> 慕壽祺，《甘寧青史略》（蘭州：俊華印書館，1936），卷十八，頁 515。

<sup>73</sup> 張穆，《蒙古游牧記》，頁 252。

<sup>74</sup> 年羹堯，字亮工，漢軍鑲黃旗人，湖北巡撫遐齡次子，康熙 39 年進士。雍正年間，以戰多內外，夾輔為重臣，後因恃功而驕，憑藉權勢，無所顧忌，結黨肆行，法難寬宥，最終正法；上命諸子徙居邊地，隔年，上念舊日年羹堯平定青海有功，可將伊子俱放回，交由年遐齡管束，以示格外之恩。引自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年羹堯奏摺專輯（下）》，頁 1129~1179。

並男女駝馬無算，其助亂之八台吉等，亦併擒獲，……青海部落，悉經平定。<sup>75</sup>

由此得知，就算羅布藏丹津想要恢復先人的霸業，也已經有心無力，推測當時的和碩特部武力已極度衰落，與清廷對抗的時間很短，就已被清廷征服平定。而清政府在平定羅布藏丹津之亂後，為加強對青海的有力統治，採納了年羹堯所奏之《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及《禁約青海十二事》，其中制定了一系列對青海影響重大的決策，包括改衛所制為府縣制，對蒙古各部行盟旗制，在藏區行千百戶制等等。

雍正三年（西元 1725 年），清政府派一等侍衛副都統達鼐到青海辦理編旗事宜，將青海二十九位洪台吉分編為二十九旗（附圖三：清代蒙古二十九旗分布示意圖），各台吉自為札薩克，統稱為五部二十九旗。當時和碩特編二十一旗，牧地在大通河上游、布哈河、布隆吉爾河、柴集河兩岸及河曲等地；另外八旗中，土爾扈特分四旗，牧地在河曲的黃河兩岸；綽羅斯（原準噶爾）分兩旗，牧地在青海湖東南地方；喀爾喀一旗，牧地在青海湖南岸；輝特部一旗，牧地在柴集河東。<sup>76</sup>總之，或遠或近，皆在青海之四面聯絡居住，依據「宜不屬青海」之原則，分別獨立編旗，慕壽祺對此評論為「使權不統一，此清初之弱蒙政策」。<sup>77</sup>

而二十九旗中，範圍均在青海湖流域內的旗有：

- （一）和碩特部南左後旗。清康熙五十年（西元 1711 年），首領噶勒丹達人什受封為札薩克輔國公，俗稱「托茂公」，原駐在今石乃亥、鐵卜加一帶，初編 200 戶。
- （二）和碩特部南右後旗。原駐地在青海湖東岸，清康熙五十年（西元 1711 年），冊封固始汗長子達顏鄂爾齊汗、次子多爾濟為札薩克輔國公，俗稱「阿喀

<sup>75</sup> 《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卷 17，頁 9~10。

<sup>76</sup> 韓官卻加，〈青海蒙古族部落的變遷與衰落〉，頁 42。

<sup>77</sup> 慕壽祺，《甘寧青史略》，卷十八，頁 519。

公」，民國三十二年（西元 1943 年），駐地在青海湖北部。

（三）喀爾喀南右旗。清雍正三年（西元 1725 年），部族首領台吉根敦受封爲公中札薩克一等台吉，俗稱「哈里哈札薩」，始封牧地在今黑馬河、江西溝一帶，初編 1000 戶，清道光年間居今海晏縣。<sup>78</sup>

在青海湖流域部分地區放過牧的旗還包括和碩特西前旗、北右旗、北前旗、北右末旗、東上旗；青海綽羅斯部南右旗頭旗、北中旗等。

年羹堯所奏之《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旨在加強對青海地區的控制，按照其內容可分爲政治、軍事、經濟及宗教四方面。《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可以說是雍正朝以來，以和碩特勢力所及的青海爲中心，並包括今日甘肅、寧夏、四川、西藏、雲南等部分地區在內的廣大區域加強控制的重要措施，它集中表現出清政府對這一地區活動的蒙藏民族的統治政策。雖然作爲一個統治者的角色，清廷對邊疆少數民族的治理措施及民族政策有其壓迫與歧視的一面，這在《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中可看出，但其中大部分的措施還是應當給予肯定的，這些措施表示清廷鞏固了對青海地區的統治、加強這些地區與中原的政治及經濟聯繫，並進一步加強對西藏的管轄權等等。<sup>79</sup>

清道光三年（西元 1823 年），清廷又分二十九旗爲左、右翼兩盟，設正副盟長統轄。爲了徹底減弱青海蒙古勢力，更將隸屬蒙古的藏族部落，分以千百戶統治，取消隸屬，歸廳衛官員直接管轄，並增西寧西北兩路防兵馬步 5000 人，設總兵於大通、安西，改西寧衛爲府，設青海辦事大臣（也稱西寧辦事大臣）直接管理蒙藏事務。自此之後的兩百年間，青海蒙古一直沿用盟旗的組織架構，並被限於各自的轄區內，由於時代與環境的變遷，讓青海蒙古逐漸從鼎盛走向衰落，直到進入國民政府時代又是另一番風景，詳情容後篇章再述。

<sup>78</sup> 青海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青海省志（八）青海湖志》（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 137。

<sup>79</sup> 《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的實行加強了青海對察木多以東地區的軍事控制，保持了入藏通道的順暢，對穩定青海及川西、康區有極大的幫助。引自王希隆，〈年羹堯「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述論〉，頁 36。



自此，我們可以看到青海蒙古人的轉變，筆者將其分為三個階段：

- 一、元時蒙古人以統治者的身份進入青海，隨著元代的滅亡，在青海各地駐紮的軍隊及王公貴族等所建立的勢力也隨即消失。
- 二、明中葉到末年，蒙古人在青海的活動增加了蒙、藏民族間的聯繫，蒙古各部也和藏傳佛教彼此產生了密切的關係，因此，促進了藏傳佛教在蒙古人中的廣泛傳播，此時主要活躍於青海的蒙古部落先為土默特部、後為和碩特部，也是以武力統治的角色進入青海。
- 三、從清民末到清初為「厄魯特蒙古」，以四部中的和碩特蒙古為主，自固始汗統一各部後，歸順清廷，和清廷保持著良好的互動關係，但終究未能持續發展。後由於新疆準噶爾部的噶爾丹勢力漸大，威脅到清廷，清廷起了收復青海之心，羅布藏丹津之亂為青海蒙古的勢力劃下了句號，青海蒙古人被收編為二十九旗，自此，青海蒙古社會走向了始料未及的未來。

## 第五節 青海藏人簡述

由於在本文開始，筆者即言明本篇論文所要討論的問題點，是蒙古人在祭青海湖儀式上的角色與關係，及蒙藏間的互動，雖然重點放在青海的蒙古人身上，但從一些資料上顯示，在青海地區，藏人是比蒙古人更早存在於青海環湖地區的原住民，為了更了解蒙古人與湖祭之間的關係，我們就必須先要了解藏人在青海地區的情況，藏人對於祭青海湖活動又有什麼樣的想法？藏人又是如何被蒙古人所影響，這些都是筆者在進入論文本文中，先要交待清楚的背景，以便讓讀者能更加了解青海地區的民族互動關係。

分布在青海的藏人，是整個藏族的一部分，人口據 40 年代的統計，約有 50

萬人，約佔青海省總人口的 25%，<sup>80</sup>也是青海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分布最廣的一支民族，安多地區藏人自稱 wod，即蕃（bod）的音轉。藏人有自己的語言，農業區的人民多半漢、藏語兼用；牧區人民則多半說藏語，藏語也像其他民族語言一樣，有許多方言，所以，在青海一帶的藏語就與西藏、川康的藏語不同，而在青海境內，康區方言（如玉樹方言）也與安多方言（如海南、海北方言）不完全相同；若以地區劃分，主要的方言有衛藏、康、安多三種，另有差異較大的嘉戎語。藏文是七世紀松贊幹布的時代所創造的，主要根據印度的梵文所來，所以字體很像梵文的一種；藏文是一種拼音文字，一直到現在，青海藏人使用的語言及文字都沒有多大的變化。<sup>81</sup>藏人原信仰苯教（bon），自西元七世紀佛教傳入後，藏人開始信仰藏傳佛教，隨著時間的長期發展，在藏傳佛教中產生了許多派系，從十三世紀開始，藏傳佛教各教派紛紛在青海建寺，由寺院所進行的教育，對藏人有普遍而深遠的影響。<sup>82</sup>

青海藏區主要位於青藏高原的東北部，境內地勢相當高聳，山脈連綿不斷，崑崙山支脈巴顏喀喇山橫亙於中部，祁連山綿延於東北，唐古喇山矗立在西南，西傾山斜立於東南，四大山系造成了起伏不定的地勢，巴顏喀喇山及青海湖以南形成了青南高原，由於長江、黃河、瀾滄江發源於此，所以青南高原也有「江河源」之稱，高原上的玉樹、果洛、海南、黃南等地，雨水較多，牧草較為茂盛，可以發展農牧業，東部地區是祁連山的尾端，山地穿插，海拔只有 2000 公尺，是青海主要的農耕地區。

明崇禎十年（西元 1637 年），和碩特蒙古固始汗和土爾扈特及輝特等部從新疆遷徙到青海西部後，初期尚能和平相處，青海的和碩特蒙古也得到發展，後固始汗進入今青海湖東南，使得原居住在青海的藏人部落被迫轉移到西寧近邊地區，而清代統治者一上台後，便與和碩特蒙古友好，支持他對藏人的控制。固始

---

<sup>80</sup> 陳光國，《青海藏族史》（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1997），頁 1。

<sup>81</sup> 陳光國，《青海藏族史》，頁 2。

<sup>82</sup>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台北：內政部委託，1992），頁 99~108。

汗的兵力本來就較其他部的力量強大，在短時間內，唐古特四大部—藏、衛、喀木、青海遂先後落入固始汗的掌握之中。<sup>83</sup>固始汗統一唐古特後，便將青海藏人分爲左、右兩翼，自西寧邊外丹噶爾寺（今湟源東科爾寺）起，沿湟水上游、青海、布哈河、布隆吉爾河至額濟納河爲界，其東與北爲左翼，西與南爲右翼，並分封給其子統治，大多數的藏人部落都被迫從青海湖地區及黃河北岸遷往黃河以南，並淪爲地主及寺院的屬民。

青海藏人原來主要分布於青海湖地區、長江源頭和黃河上游等處，明代中葉，蒙古人進入青海，以今之海北、海南、海西等州爲其基地，原居住在青海湖周圍及黃河北岸各地的藏族，大多數被迫遷往黃河以南，受到土默特蒙古諸部的統治。明末清初，厄魯特蒙古和碩特部，攻滅了在青海游牧的土默特諸部，又消滅了喀爾喀部的卻圖汗後，青海藏人轉而受到和碩特蒙古的統治。明代與清代初期，中央政府聽任這樣的事實存在，其地方官員也不過問藏人的事務；直到清雍正二年（西元 1724 年），清廷平定了羅布藏丹津之亂後，才下令規定青海藏人各部要直接受地方各級政府的管理，並派員清查戶口，劃定地界，授以藏人部落首領千百戶等職位，統領當地的藏人部落，不再隸屬於青海蒙古各部，藏人才算擺脫了蒙古人的統治。

在這樣的情況下，被迫南遷的藏人部落力圖要回到黃河以北地區，重新取得在青海湖沿岸放牧牛羊的權利，但是，清政府及西寧辦事大臣均不允許，因爲他們認爲：番人過河後，蒙番雜處，易生事端。故一再地限制藏人遷移過黃河。<sup>84</sup>清廷限制藏民必須居住在黃河以南，卻又對他們集征賦稅，擾民至極，常常弄到民不聊生；另外，西寧辦事大臣爲了控制藏民，嚴禁向藏人牧區運輸茶糧，對於人民生活上造成極大不便。由於經濟的因素，黃河以南的藏人部落常常違規前進到黃河以北地區放牧，也形成了清代中期以後，蒙藏民族的衝突更加激烈，至於詳細情形，請容後再述。

---

<sup>83</sup> 陳光國，《青海藏族史》，頁 348。

<sup>84</sup> 陳光國，《青海藏族史》，頁 349。

在清代統治中，藏人部落數目時有增減，其游牧地方也常有變更，在 1949 年前，習慣將青海藏人的各部劃分為游牧和農耕的地區，其中牧區部落主要有玉樹二十五族、環海八族、果洛三族等。大多數藏族生活在高原冷區，自然條件十分惡劣，主要從事牧業生產，環湖八族比較集中在環湖次暖區，從事游牧業，海東各族人數不多，分布較散，主要生活在東部暖區，主要從事農業生產。<sup>85</sup>

青海的藏人可以稱得上是青海的原住民，直到和碩特蒙古進入青海地區之後，青海藏人開始受到和碩特的統治，和碩特剛開始採用較寬鬆的方式收取稅額，以補充自己部落所需，隨著其武力的壯大，收取的稅額也愈來愈重，對青海的藏人而言無疑是一大負擔，但是藏人也無力反抗。和碩特蒙古進入青海之初，與藏人間關係是蒙強藏弱，藏人完全處在蒙古的統治之下；在清政府力量介入青海之後，才將蒙藏的勢力扭轉，進而造成蒙弱藏強的局面。詳情容後再議。

---

<sup>85</sup> 何峰，〈從土地所有制看青海牧區藏族部落的社會形態〉，《西藏研究》，1991 年第 3 期，頁 50。